

“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

张志原 李 论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研究,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却很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传播过程。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并基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 2014—2018 年 64 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中均有体现,即沿线国家之间的成功经验、经济竞争压力以及政治制度相似性都能够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强化“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中国单方面的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传导作用也同样至关重要。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政策扩散 国际合作 事件史分析法

【作者简介】 张志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zhiyuanzhang@link.cuhk.edu.hk

李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l-li19@mails.tsinghua.edu.cn

从 2013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被首次提出,到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再到“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拓展至大洋洲、南美洲等地区的国家,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历经了“初创→小范围合作→沿线扩展→全球扩展”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成了初具规模的合作

体系。截止到2019年8月,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先后加入了“一带一路”共建体系,与中国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在发起之初受到很多质疑的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能取得如今的成绩实属不易。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发展、得到诸多国家不同形式的响应之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哪些国家会选择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有的国家积极加入,甚至一些不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位置的国家也会选择响应?而与此形成对照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冷淡?哪些因素在影响着这些国家选择或者不选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此外,沿线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在特定时间节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解释各国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时间的先后?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思考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国家为什么会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

现有的“一带一路”研究大多聚焦于特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案例分析方法,研究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进而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① 尽管这些研究发现了一系列影响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响应的因素,如国内外政治局势、经济发展需求、与中国关系等^②,但

① 参见: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29—43页;张骥、陈志敏:《“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36—52页;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10期,第104—132页;周方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合作的机遇、瓶颈与路径——兼论中泰倡议合作探路者作用》,《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39—47页;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21—41页。

② Anastas Vangeli,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Sixteen Countries of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5, No. 5, 2017, pp. 101-124; Wang Dong, “Mainland China Debates U. S. Pivot/Rebalancing to Asia,” *Issues & Studies*, Vol. 50, No. 3, 2017, p. 57; Shannon Tiezzi,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Economic Lifeline?” *The Diplomat*, July 14,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7/the-belt-and-road-chinas-economic-lifeline>,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0日;米拉、施雪琴:《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79—91页;王玉主:《“要约—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53—72页;吴杰伟:《菲律宾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31—42页;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46—71页。

仍然存在两点缺陷:首先,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国家内外部的结构性因素,忽略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换言之,国家不仅会考虑经济社会状况、国际局势及立场等相对稳定的因素,还会根据其他周边的国家的行动,即时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其次,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案例分析,尽管可以对合作机制作出细致剖析,但却难以获得对“一带一路”合作的规律性总结,样本量过小也导致对国家间互动的分析可能是有偏误的。

本文将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一带一路”的研究中:一个国家是否参加国际合作的决策不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还可能是观察他国政策后学习、竞争和模仿的结果。解释一国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考虑政策扩散带来的影响,沿线国家需要观察其他国家的行为来获得可用的信息,帮助本国做出适当的决策。具体而言,沿线国家在决定是否加入“一带一路”时,会学习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会因为与他国的经济竞争关系而采取更主动的行为,也会模仿与自己制度相似的国家的行为,这些扩散机制有助于解释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响应中的差异性行为。本文将基于2014年到2018年64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现有的“一带一路”研究做了总结。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核心论点,将沿线国家选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行为视为政策扩散,重点关注扩散机制如何影响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第三部分对本文的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研究方法做了详细的描述。第四部分展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作出展望。

一、“一带一路”研究述评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沿线国家的响应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积极响应,有的则迟疑不决?为什么有的国家出现了由消极迟疑到积极欢迎的态度转变?哪些因素在形塑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学界已有诸多探讨,可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从宏观层面上论述“一带一路”的价值属性和理

论基础,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应然价值;第二个层面是以国家为单位,详尽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利益考量。

具体地,在宏观层面,郑伟和桑百川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国际背景是世界市场失灵,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对金融体系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垄断、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负外部性严重和贫富差距等,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一项崭新的、助力解决世界市场失灵问题的方案。^① 黄河与陈小鼎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区域公共产品的属性,凭借该项倡议与地区需求的深度对接以及遵循“受益人支付”的原则,既能够有效避免大国的“私物化”和小国的“搭便车”,也能够促进区域合作的达成,培育政治互信,塑造稳定的区域秩序。^② 卢锋等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经济后进国家和众多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响应,原因在于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凭借着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性价比最高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够有效帮助沿线国家弥补储蓄与贸易的相对劣势;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进行产业转移,中国能够为沿线承接国家提供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③

微观层面的讨论具体表现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分析,覆盖了俄罗斯、印度、印尼、越南、澳大利亚、缅甸和日本等国,这些国家有的积极响应,有的迟疑不决,有的则出现了前期冷淡、后期升温的态度转变。这些分析相对具体,大多是基于分析对象的经济发展诉求、国内政局、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立场来展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着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为本国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尤其是基础设施

① 郑伟、桑百川:《“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基础探析——基于世界市场失灵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第94—105页。

②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38—155页;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37—55页。

③ 卢锋、李昕、李双双,等:《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第9—34页。

建设的提升,有着诸多期待,缅甸、越南和土耳其均在此列。^① 沈予加在分析澳大利亚始终未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实质性对接时指出,美澳同盟的维护和执政党国内执政基础的薄弱,是导致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趋于保守的重要因素。^② 由此可见国内政局和外交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响应与否的影响。林民旺、张超哲、毛悦和张根海等人在对印度的分析中,都不同程度地指出,印度作为南亚的区域性大国,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心主要体现在:第一,与巴基斯坦存在紧张的外交关系,而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者,且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代表性项目;第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后,印度在地缘政治层面影响力存在着衰弱的可能;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恢弘,跨越多个国界,涉及与多个国家主管部门的协调,在设计和运作上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对该倡议实施的前景并不乐观。^③ 而根据拉丽萨·斯米尔诺娃(Лариса Смирнова)对俄罗斯主流媒体的观点梳理可知,同属大国的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具有和印度同样的担心,也因此在与“一带一路”开展战略对接时,“俄罗斯一直强调双方开展的合作必须‘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进行’,而这一联盟正是由俄罗斯掌握话语权的”^④。

颇为遗憾的是,上述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讨论鲜有交集,学者们要

① 李晨阳、宋少军:《缅甸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20—30页;顾强:《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对越南进行的实证调研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5期,第97—109页;王勇、希望、罗洋:《“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70—86页。

② 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87—98页。

③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张超哲、高雅:《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演变、动因及应对》,《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1期,第86—93页;毛悦:《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看印度外交思维模式》,《国际论坛》2017年第1期,第34—41页;张根海、王颖:《印度周边战略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理论视野》2018年第3期,第81—86页。

④ 拉丽萨·斯米尔诺娃、嵯明亮、张欢欢:《俄罗斯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1期,第82—97页。

么从宏观层面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基础,即该倡议得到响应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要么从较为微观的沿线国家具体国情着眼,综合这些国家内部的官方表态、智库研究和媒体评论来分析沿线国家的国家利益考量,进而为该国的响应与否提供解释和印证。问题在于,通过宏观层面的论证,我们只能知晓“一带一路”倡议在应然上对沿线国家的裨益之处;而通过微观层面的国别分析,我们也只能对单个国家的行为选择作出基于该国具体情况的实然评析,这种评析往往仅适用于一国,而不具有普遍性和可扩展性。即便有学者作出对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影响因素的归纳尝试^①,但仍然缺乏扎实的实证检验和支撑,难以将案例分析的结论上升至理论层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何选择响应这一问题提供更为明晰且更具普适性的解释框架。

此外,现有研究在理论解释力上也存在欠缺。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宏观理论研究大多关注于静态的结构因素,如国家间的权力均衡、经济贸易、社会交往、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观念认同等。这些解释因素忽略了国际合作中的动态交互因素,对国际合作中的时间因素和时序性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事实上,国家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身的政策作出灵活的调整,也会参考先行者的经验作出决策,从而产生自发传播和扩散的过程,而现有的理论很难对这些现象给出有力的解释。

总结一下,从理论上讲,现有的“一带一路”宏观理论研究大多着眼于国家内外部的结构性因素,普遍忽视了沿线国家间的互动因素。从方法上看,现有的“一带一路”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国家的案例分析,所挖掘出的机制难以一般化和理论化。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一带一路”的研究中,既可以为解释沿线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提供理论依据,也能利用大样本的定量方法得出一般性的规律。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① 陈涛涛、金莹、吴敏,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体系构建与舆论挑战——基于国际直接投资视角的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9年第2期,第4—19页;刘昌明、孙云飞:《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反响与应对策略》,《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30—39页。

二、政策扩散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响应

政策扩散指的是一项新型的政策在被某一政策主体采纳后,又被系统内其他主体先后采纳的过程。在当前政治学、公共管理研究中,政策扩散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目前,大多数关于政策扩散的研究文献都集中于国内政治领域,当某一层级的政府的决策受到其他政府早期决策的影响时,政治决策就发生了扩散。^① 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揭示了政府间政策扩散的内部因素和交互因素。^② 其中,内部因素指的是一个地区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如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财政收支和政党政治。^③ 交互因素指的是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包括“学习机制”,即政府会学习其他政府成功的政策经验;“竞争机制”,即有竞争关系的政府间会争相采纳新的政策;“模仿机制”,即在决定是否采纳政策时,政府会模仿与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相似的政府的行为。^④

① Frances Stokes Berry and William D Berry,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2, 1990, pp. 395-415.

② Erin R Graham, Charles R Shipan and Craig Volden,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3, No. 3, 2013, pp. 673-701.

③ Jack L Walker,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3, 1969, pp. 880-99. Zhu Xufeng and Zhang Youlang, "Political Mobility and Dynamic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 Spread of Municipal Pro-business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26, No. 3, 2016, pp. 535-51; Frances S Berry and William D Berr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in Paul A Sabatier and Christopher M Weible, eds.,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Boulder, CO: Westview, 2014), pp. 307-59.

④ Henry R Glick, Scott P Hays, "Innovation and Reinvention in State Policymaking: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Will Law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3, No. 3, 1993, pp. 835-850; Virginia Gray, "Competition, Emulat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Lawrence C Dodd and Calvin C Jillso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4), pp. 230-48.

在国内政策领域里,政府之间可以通过学习、竞争、模仿等机制影响政策扩散的发生。^①而在国际扩散中,这些机制同样在国家间存在。本文拟将政策扩散机制引入国际合作的分析领域,把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视为一种政策扩散过程。本文的核心理论观点是:政策扩散机制对于理解沿线国家是否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沿线国家通过观察其他国家的行为,进而判断自己是否要加入“一带一路”。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模仿机制”同样也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中。

本文提出了四个有待检验的核心假设。

假设1 “学习机制”:如果一个沿线国家在加入“一带一路”后与中国的贸易量出现增长,那么其他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将会提升。

假设2 “竞争机制”:如果一个沿线国家选择加入“一带一路”,那么与其经济结构相似度高的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将会提升。

假设3 “模仿机制”:如果一个民主体制的沿线国家选择加入“一带一路”,那么与其政体相似的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将会提升。

假设4 扩散机制的交互作用:如果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越紧密,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响应扩散中“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效应都会更强,但“模仿机制”的效应会更弱。

以下将对上述假设进行详述。

(一) 学习机制

政策的成功与否会塑造后来者对于政策价值的判断,进而影响是否采纳此项政策,这就是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②“学习机制”在国际边界协定签署中体现明显,边界协议的成功签署传递了一种可信的信号,即该国有能力和意愿解决边界问题,周边的其他国家会习得这一成功经验,增加该国后续边界协议成功签署的可能性。^③除政府外,政党也会学习其他国家党派

^① Zhang Youlang and Zhu Xufeng, “Multiple Mechanisms of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Vol. 21, No. 1, 2018, pp. 495-514.

^② Virginia Gray, “Innovation in the States: A Diffusion Stud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1973, pp. 1174-85.

^③ K Chad Clay and Andrew P Owsiak,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Border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8, No. 2, 2015, pp. 427-442.

成功竞选的经验,从而形成竞选策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散。^①

“学习机制”意味着国家并不只是盲目跟风,只有观察到其他国家从国际合作中获得了切实的好处,才会效仿和加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先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的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后来者对于“一带一路”前景的判断,进而影响其是否选择响应。作为一项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能够为沿线国家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与中国贸易量的提升。有学者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量,而这种成功的合作经验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行为。^②

以“一带一路”倡议在西欧的拓展为例,西欧国家并不算是初始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倡议提出后的几年内都没有明确的表态。然而随着“一带一路”成功经验的增多,扩大贸易规模与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使得一些欧洲国家的态度开始松动。2019年,意大利正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G7国家。正如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Michele Geraci)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所提到的,“一带一路”对促进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意大利此举“要弥补过去浪费的时间,要抓紧加快与中国的经贸合作”。^③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即先行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后的成功经验会被后来的国家所学习,进而增加后来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

(二) 竞争机制

除了相互学习,竞争关系也会引发政策扩散和增加政策采纳的可能性。“竞争机制”指的是主体间为争夺资源而争相采纳某项政策的过程。^④ 在国

① Tobias Bohmelt, “Party Policy Diffu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0, No. 2, 2016, pp. 397-410.

② 孙楚仁、张楠、刘雅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1期,第18—20页。

③ 凤凰网:《意大利官员:两个欧洲国家正考虑加入一带一路》,2019年3月26日, <http://finance.ifeng.com/c/7lMHgjK5Yrg>, 引用日期:2019年10月11日。

④ Gilardi, Fabrizio, “Who Learns from What in Policy Diffusion Proce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2010, pp. 650-66.

际关系领域,竞争不仅包括政治和军事上的博弈,也体现在经济与贸易方面。例如,双边投资条约的扩散是由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所驱动的,即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竞争者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那么就会给该国家增加压力,增加其采纳双边投资协定的概率。^① 本文认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当沿线国家看到其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加入了“一带一路”后,会更加担忧其在获得了来自中国的贸易、投资等资源后获得更大的优势,因此会增加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

如何衡量国家间的竞争关系一直是国际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有研究指出,经济结构的相似程度是衡量两个国家间经济竞争关系的有效指标。一对国家存在着相似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进出口商品项目,意味着二者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特别是在对于外国资本的争夺上存在较量。^② 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例如,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在经济结构和出口项目上同质性强,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度高。因此,在2016年柬埔寨与老挝率先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后,其他东盟国家(除了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菲律宾)都在2017年迅速响应,并与中国签订了合作协议。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即沿线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可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

(三) 模仿机制

公共政策的国际扩散领域也存在“模仿机制”,即国家会模仿那些与自己情况相近的国家的政策采纳情况,帮助自己作出决策。^③ 在“一带一路”倡议响应中,“模仿机制”也是一种国家间相互习得经验的方式。在面对一项

① Zachary Elkins, Andrew Guzman and Beth Simmons, “Competing for Capital: The Diffu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60—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2006, pp. 811-846.

② Joseph Finger, Mordechai Kreinin, “Measure of Export Similarity and Its Possible Uses,” *Economic Journal*, Vol. 89, 1979, pp. 905-912

③ Tomila Lankina, Alexander Libman, Anastassia Obydenkova,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Diffusion in Post-Communist Regions,” Vol. 49, No. 12, 2016, pp. 1599-1629.

具有不确定性的合作协定时,国家需要寻求可靠的信息源来帮助自己做出决策。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一个较大的阻力来源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了解与不信任,由此产生了很多阴谋论的看法,西方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曾对“一带一路”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提出过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相似度就会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参考指标。有经验证据表明,民主国家之间更有可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更容易促成国家间合作。^① 如果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选择了加入“一带一路”,相当于向其他民主国家间接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一带一路”倡议是可靠的,从而缓解其他民主体制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担忧,进而增大其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

关于“模仿机制”,与“一带一路”紧密相关的另一项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例子。在亚投行的发起之初,西方社会抱有较强的提防心理,对于亚投行的治理能力、公平性和透明性都存在质疑,直到英国于2015年3月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初始成员国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也纷纷选择加入。由此可见,民主体制的国家间具有很强的模仿效应,能够促进国家合作协定的扩散。据此我们得到假设3,即沿线国家间的政治制度相似性会带来模仿效应,提升参加“一带一路”的可能性。

(四) 扩散机制的交互作用

最后,上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学习机制”是对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效仿,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越紧密,合作基础越好,则意味着他国的成功经验更有可能在本国被复刻,因此“学习机制”的效应就会越强,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上升。“竞争效应”源于经济结构相似带来的国家间竞争,而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越密切、合作往来越多,意味着沿线国家面临着更大的与中国合作机会被他国争抢的风险,加入“一带一路”的需求会更迫切,因此“竞争机制”的效应也会更强,从而增加响应

^① Doyle M Peace, “Liberty, and Democracy: Realists and Liberals Contest a Legacy,” in Michael Cox, G John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带一路”倡议的概率。

与“学习机制”“竞争机制”不同,本文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更紧密会弱化“模仿机制”。“模仿机制”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需要观察自己认为可靠的国家的行为,来辅助自己的决策。而如果沿线国家已经和中国保持较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则不需要依靠他国的信息来辅助判断,“模仿机制”的效应也会更弱。因此,我们提出了假设4,即如果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越紧密,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响应扩散中“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效应都会更强,但“模仿机制”的效应会更弱。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对2014到2018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扩散进行研究。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外出访中正式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愿景,并于同年11月得到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正式确认。在此之后,中国开始与各沿线国家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由此,2014年可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起始年份。

在沿线国家的选取范围上,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与合作机制,也明确了“一带一路”的覆盖范围:“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①根据这一规划,共计有64个国家可以被定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即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一带一路”规划路线的沿线地区,且具备潜在的参与响应可能。本文将这

^①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9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309/c411452-29134334.html>,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1日。

64个国家依据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和东欧等7个地区,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

地区	国家
东亚	蒙古国
东南亚	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东帝汶
南亚	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
中亚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西亚	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拉酋、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曼、约旦、沙特阿拉伯、阿塞拜疆、黎巴嫩、格鲁吉亚、也门、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
北非	埃及
东欧	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黑、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黑山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包括其后以南非、智利等国为代表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国家”,这些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却也以不同形式对“一带一路”倡议予以响应。本文认为,这些国家的加入属于“一带一路”拓展中的“意外之喜”。如果采用更广义的界定,对于研究对象的总体的界定将会更加模糊,会更难判断潜在的“一带一路”参加者。因此,本文对这些自然延伸国家予以剔除。

(二) 研究方法

在模型设定方面,本文将采用配对事件史分析法(dyadic event history analysis)来检验分析“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响应及其扩散机制。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是在政策扩散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的量化方法,其目标在于描摹个体在指定时间跨度内行为发生的变化。在该方法中,因变量是一个由0和1构成的虚拟变量,当个体经历变化,则记为1,否

则就维持在 0。因变量为虚拟变量的这一特点使得 logistic 回归成为本文选用的估计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配对事件史分析法, 是对于传统事件史分析法的进一步改进: 通过将每个分析单元进行两两配对, 可以更清晰地解释在政策扩散中, 一个地区的决策如何受到另一个地区行为的影响, 从而探讨更加丰富的扩散机制。配对事件史分析法最早在对美国儿童保险政策改革的研究中被提出, 该研究将 50 个州进行两两配对组合, 结合事件史分析法, 发现那些改革成效较好的地区, 其改革方案更容易被效仿, 进而首次提出了政策扩散的学习机制。^① 政策扩散的本质在于政策主体间的相互影响, 传统的事件史分析法只能描述已采纳政策的所有政策主体对于后来者的影响。相比之下, 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则可以将每一对政策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描述清楚。目前, 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已逐渐成为政策扩散研究中的主流方法, 在一些国际扩散的研究中也屡有涉及。^②

本文关心的核心事件是“是否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而本文所选用的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响应的标准是该国是否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的双边合作文件。这里的合作文件既包括合作协议, 也包括谅解备忘录的形式。^③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是“一带一路”的官方门户网站“中国一带一路网”, 网站中的“政策环境—双边文件”专栏列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签署的双边文件。此外, 我们也以国家发改委网站和商务部网站上公布的相关合作文件作为补充。各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时间和签署合作文件的名称可以参考附录 1。截止到 2018 年, 64

① Craig Volden, “States as Policy Laboratories: Emulating Success in th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2, pp. 294-312.

② Sean Nicholson-Crotty and Sanya Carley, “Effectiveness,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 or Can We Make That Work for Us?” *State Politics & Policy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Vol. 16, No. 1, pp. 44-77.

③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签署流程是: 首先签署合作意向书, 然后签订备忘录、框架条款, 最后签订正式的合同和协议。而在一些情况下, 对于一个协议的修改也可以被称为备忘录。因此, 我们将签署备忘录和合作协议都视为沿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正式响应。

个沿线国家中已有 54 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为了更好地适用于配对事件史分析法,本文对数据结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对于每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A,我们都和其他 63 个沿线国家 B 进行两两配对,共产生 4032(64×63)种国家配对组合。由于研究的时间区间是 2014—2018 年,因此共得到 20160 个(4032 个配对 $\times$ 5 年)“配对一年”的数据点。在每一个配对中,我们将 B 国家定义为先行者,即先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A 国家则是后来者。本文所要观测的扩散效应就是先行国家 B 加入“一带一路”是如何影响后来者 A 国的决策的。在数据清理方面,我们删除了国家 A 早于或等于国家 B 响应“一带一路”时间的样本,由此保证政策扩散发生的先后时序性。进一步地,如果国家 B 于第 $t-1$ 年加入了“一带一路”,那么“国家 A—国家 B”的配对从第 t 年开始赋值;如果在第 $t+n(n \geq 0)$ 年 A 国加入了“一带一路”,则因变量记为 1,否则记为 0。遵循事件史分析法的惯例,国家 A 加入“一带一路”后(因变量变成 1 后)的数据被删除。此外,为了消除潜在的样本偏误,我们也删除了那些国家 B 加入“一带一路”当年以及此前的样本,因为只有在国家 B 加入的下一时期,才存在国家 A 和国家 B 的相互影响关系。

以孟加拉国(2016 年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协议)为例,当孟加拉国作为国家 A 时,它可以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国家 B)构成 63 种配对情况、315 个(63 个配对 $\times$ 5 年)配对数据点。但是由于时间先后顺序,只有当国家 B 的采纳时间早于 2016 年时,孟加拉国的决策才可能受到该国的影响,因此只能保留“孟加拉国—斯里兰卡(2014 年加入)”“孟加拉国—土耳其(2015 年加入)”等几个配对,其他配对则被删除。以其中的一个国家配对“孟加拉国(国家 A,2016 年加入)—斯里兰卡(国家 B,2014 年加入)”为例,根据我们上文中的处理方法,该配对在各年的取值为 0(2015)、1(2016)。删除 2015 年前的数据是因为 2014 年时斯里兰卡刚刚加入“一带一路”,只能影响孟加拉国在下一期(也就是 2015 年)的行为。删除 2016 年后的数据是因为,按照事件史分析法的模式,事件发生后的数据应当被删除。每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会按照上述的方案进行处理,最终共获得了 2014—2018 年 2830 个配对数据点。

(三)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它所测量的是在“国家 A—国家 B”所构成的一个配对中,在某一特定年份 t ,国家 A 是否签署了“一带一路”双边文件。这是一个二元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国家 A 在 t 年与中国签署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双边合作文件,则因变量编码为 1,否则即被编码为 0。因变量将是一组生存数据,在 t 年一旦编码为 1,代表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响应,则这一观察单位 A 在 t 年后的数据将被删除,不再显示。

2. 自变量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响应中的扩散效应,具体包括“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以及三种扩散机制和中国合作关系的交互作用。首先,关于“学习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以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双边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的的国际合作倡议,在加入“一带一路”后,与中国贸易量实现提升无疑是一种成功达到目标的表现。因此,我们使用国家 B 在第 $t-1$ 年加入“一带一路”后,第 t 年与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的增加值来度量“学习机制”,与中国贸易增加越多,说明 B 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决策越成功,就越能增加 A 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

关于“竞争机制”,本文使用 A 国和 B 国的经济结构相似程度来测量,我们构建了一个国家间经济结构相似度指数:

$$S_{ab} = \sum_{k=1}^n (X_{ak} X_{bk}) / \sqrt{\sum_{k=1}^n X_{ak}^2 \sum_{k=1}^n X_{bk}^2}$$

S_{ab} 代表 A 国和 B 国经济结构相似度指数, X_{ak} 代表 A 国的 k 产业占 GDP 的比重, X_{bk} 代表 B 国的 k 产业占 GDP 的比重。 k 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0 \leq S_{ab} \leq 1$,当 S_{ab} 越趋近于 1 时,意味着 A 国和 B 国经济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当 S_{ab} 越趋近于 0 时,意味着两国经济结构相似程度越低。

关于“模仿机制”,本文使用 A 国和 B 国是否同为民主国家来测度。

本文使用 polity IV 数据库的政体指数,取值为-10到10,数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如果A国和B国的 polity IV 指数都大于6则变量记为1,反之为0。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三部分,分别是“A国政治经济变量”“A国与中国的关系变量”与“A国—B国的配对变量”。首先,本文控制了一系列A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变量,具体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和宽带覆盖率,分别用于衡量A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现阶段经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因为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需求。其中,人均GDP取自然对数,GDP增长率和宽带覆盖率是百分数的形式,三个变量均做滞后一年处理,用以反映上一年的经济状况对下一阶段的决策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控制了A国与美国的关系。“一带一路”被一些学者视为对美国区域霸权的挑战,而一些沿线国家也的确存在对美国的忌惮,对加入“一带一路”的态度摇摆不定。^① 本文选择的测量方式来源于 correlates of war 数据库中的政治同盟关系指标,该数据涵盖了从1816年到2012年各国间三种不同层级的正式同盟关系。如果在2012年时,国家A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共同防卫协定、中立状态协定或互不侵犯协定中的一种,则虚拟变量记为1,否则记为0。本文还控制了A国的政体变量,数据来源于 polity IV 数据库。

第二部分的控制变量是A国与中国的关系变量。具体包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领土接壤状况、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以及与中国贸易占GDP的比重。首先,关于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的8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如果沿线国家A与中国没有伙伴关系,则变量记为0;如果沿线国家A与中国只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则变量记为0.5;如果沿线国家A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则变量记为1。

与中国的领土接壤状况来源于 correlates of war 数据库中的领土接壤

^①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政治与经济》2015年第10期,第30—59页。

指标,涵盖了从 1816 年到 2016 年的领土变更状况,我们将这一指标与本文的国际合作扩散数据库进行匹配。其中,2016 年后的数据用 2016 年代替,测量指标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 A 国与中国存在陆地或水域上的接壤状况则记为 1,否则记为 0。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则选取自 correlates of war 数据库中的军事冲突数据库,如果国家 A 和中国在 1991 年冷战结束之后发生过武装冲突,则变量记为 1,否则为 0。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史节点,冷战后的冲突更能反映出国家间的对立关系。最后,A 国与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我们将这一数值除以当期 A 国的 GDP 总量并滞后一年,用以衡量 A 国对中国的经贸往来密切程度。

第三部分的控制变量是 A 国与 B 国的配对变量。我们分别控制了 A 国与 B 国的政治同盟关系、军事冲突关系和领土接壤关系,这三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的形式,数据均来源于 correlates of war 数据库,测量方式与上文相同。最后,我们还设置了时间变量,计算方式为自每个国家配对开始存在后计数,计算随着每年的时间推移,各配对延续的时间长度,单位为年。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加入时间变量、时间变量的平方项与时间变量的三次方项来控制时间趋势。变量设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A 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830	0.387	0.487	0	1
自变量	学习机制(B 国贸易增长率)	2025	0.059	0.162	-0.386	0.370
	竞争机制(A 国—B 国经济同质程度)	1512	0.954	0.050	0.722	1.000
	模仿机制(A 国—B 国同为民主政体)	2830	0.655	0.475	0	1
A 国政治经济变量	人均 GDP	2634	8.774	1.308	6.35	11.09
	GDP 增长率	2634	3.157	4.103	-25.91	20.63
	宽带覆盖率	2573	9.772	9.355	0	30.08
	美国盟友	2830	0.057	0.231	0	1
	政体	2582	0.973	7.482	-10	10

续表

类别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国与中国 关系变量	与中国伙伴关系	2830	0.307	0.444	0	1
	与中国接壤	2830	0.228	0.419	0	1
	与中国军事冲突	2830	0.140	0.347	0	1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2611	0.133	0.175	0.002	0.905
A 国—B 国 配对变量	同盟关系	2830	0.071	0.258	0	1
	军事冲突关系	2830	0.034	0.180	0	1
	接壤关系	2830	0.052	0.223	0	1

四、研究结果

本文选择 2014—2018 年作为政策扩散的观察期。在这 5 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的 64 个国家中有 54 个国家通过签署双边文件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响应。本文统计了自 2014 年起,每月响应国家的数量,并以累积曲线的形式绘制了图 1。可以发现,在“一带一路”提出后的初始时期,选择响应“一带一路”并与中国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家数量较少,仅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中国周边邻国或是经济合作密切的国家选择加入;而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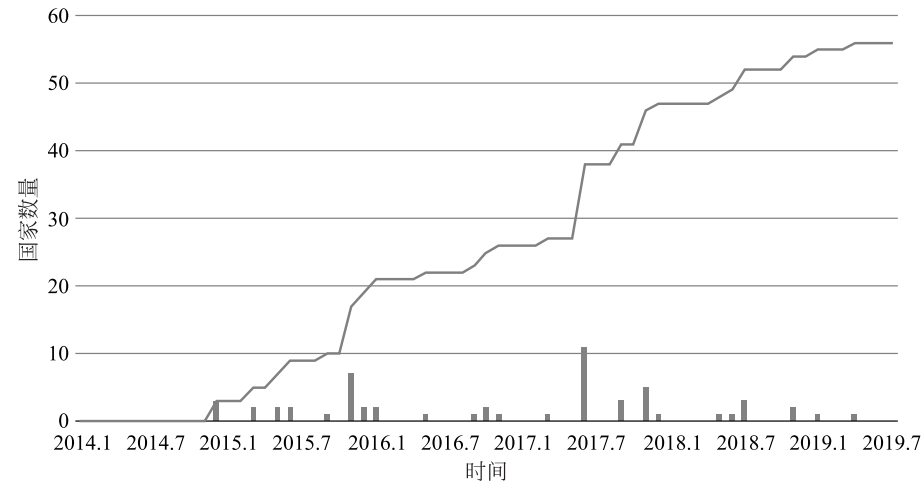


图 1 “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累积曲线(2014—2019)

“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熟,选择加入的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并在 2015 年末及 2017 年中旬出现两个峰值,前者是中东欧国家的集中加入,后者是与一系列亚洲国家协议的正式签署;最后,随着大部分沿线国家的加入,“一带一路”的扩散再度回归了平缓状态。

在描述了“一带一路”的扩散趋势后,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检验各类扩散机制的存在。在表 3 中,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扩散的“学习机制”进行检验。模型一控制了时间趋势,即时间变量、时间变量的平方与时间变量的三次方。学习效应的结果显示,如果 B 国在加入“一带一路”后与中国的贸易量出现了增长,A 国更有可能去学习这一成功经验,提高了 A 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在模型二到模型四中,我们又分别加入了 A 国控制变量、A 国与中国的关系变量以及 A 国—B 国配对控制变量,学习效应仍然保持正向显著。为了方便解读 logit 模型的系数,我们计算了模型四的概率比(odds ratio)。结果显示,当先行的国家 B 在加入“一带一路”后与中国贸易增长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后来的国家 A 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 0.36 倍。

表 3 “一带一路”倡议扩散的学习效应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学习机制” (B 国贸易增长率)	2.365 ***	2.592 ***	3.637 ***	3.601 ***
	(0.370)	(0.455)	(0.567)	(0.562)
A 国政治经济变量				
人均 GDP		-1.429 ***	-1.583 ***	-1.593 ***
		(0.0986)	(0.114)	(0.115)
GDP 增长率		0.106 ***	0.132 ***	0.133 ***
		(0.0180)	(0.0240)	(0.0240)
宽带覆盖率		0.182 ***	0.207 ***	0.207 ***
		(0.0112)	(0.0168)	(0.0172)
美国盟友		-0.0222	-0.646	-0.647
		(0.238)	(0.476)	(0.478)
政体		-0.0523 ***	-0.00655	-0.00620
		(0.0116)	(0.0131)	(0.0132)

续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A 国与中国关系变量				
与中国伙伴关系			2.279***	2.270***
			(0.244)	(0.249)
与中国接壤			0.113	0.104
			(0.235)	(0.240)
与中国军事冲突			-5.130***	-5.155***
			(0.771)	(0.777)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3.710***	-3.714***
			(0.414)	(0.424)
A 国—B 国配对变量				
同盟关系				-0.128
				(0.317)
军事冲突关系				-0.125
				(0.560)
接壤关系				0.663
				(0.454)
常数项	-2.484***	7.180***	6.856***	6.883***
	(0.365)	(0.827)	(0.860)	(0.863)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2	0.0706	0.214	0.385	0.386
N	2025	1653	1630	1630

注：表中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时间趋势项包括：每一个配对的持续时间（单位为年），持续时间的平方，持续时间的三次方；标准误在每个国家配对层面做聚类处理，* $p<0.1$ ，** $p<0.05$ ，*** $p<0.01$ 。

表 4 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扩散中的“竞争机制”。在模型一的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竞争效应的回归系数正向并在 $p=0.1$ 的程度上显著，说明如果先行国家 B 与后来的国家 A 存在着较高的经济结构相似度，那么国家 B 加入“一带一路”会对国家 A 形成竞争压力，进而提高国家 A 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在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中，我们分别加入各类控制变量。在模型二到模型四中，“竞争机制”的回归系数始终保持正向，尽管在模型二

中并不显著,但在模型三加入 A 国与中国的关系变量,在模型四加入 A 国与 B 国的经济相似度后,仍然保持了 $p < 0.05$ 的显著度。从模型四可以看出,当 A 国和 B 国的经济结构相似度提高一个百分点,A 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 0.19 倍。

表 4 “一带一路”倡议扩散的竞争效应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竞争机制” (A 国—B 国经济同质程度)	1.978 [*] (1.055)	1.683 (1.302)	3.460 ^{***} (1.356)	2.967 ^{**} (1.384)
A 国政治经济变量				
人均 GDP		-1.362 ^{***} (0.111)	-1.708 ^{***} (0.135)	-1.743 ^{***} (0.136)
GDP 增长率		0.120 ^{***} (0.0210)	0.215 ^{***} (0.0410)	0.233 ^{***} (0.0425)
宽带覆盖率		0.187 ^{***} (0.0128)	0.189 ^{***} (0.0193)	0.193 ^{***} (0.0201)
美国盟友		0.0348 (0.226)	-0.704 (0.440)	-0.757 [*] (0.455)
政体		-0.0560 ^{***} (0.0126)	-0.00533 (0.0137)	-0.00508 (0.0139)
A 国与中国关系变量				
与中国伙伴关系			2.375 ^{***} (0.283)	2.460 ^{***} (0.291)
与中国接壤			-0.769 ^{***} (0.295)	-0.851 ^{***} (0.298)
与中国军事冲突			-5.414 ^{***} (0.779)	-5.610 ^{***} (0.823)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6.053 ^{***} (0.601)	-6.253 ^{***} (0.600)
A 国—B 国配对变量				
同盟关系				0.168 (0.413)

续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A 国—B 国配对变量				
军事冲突关系				−0.462
				(0.701)
接壤关系				1.808 ***
				(0.559)
常数项	−4.560 ***	4.768 ***	4.377 ***	4.841 ***
	(1.097)	(1.472)	(1.574)	(1.605)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2	0.0481	0.190	0.405	0.415
N	1512	1359	1336	1336

注：表中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时间趋势项包括：每一个配对的持续时间（单位为年），持续时间的平方，持续时间的三次方；标准误在每个国家配对层面做聚类处理，* $p < 0.1$ ，** $p < 0.05$ ，*** $p < 0.01$ 。

在表 5 中，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扩散的“模仿机制”做了检验。在模型一的基准回归中，“模仿机制”的回归系数呈正向显著。这说明当先行国 B 和后来国 A 同为民主政体时，如果 B 国率先加入了“一带一路”，那么 A 国也更有可能会响应“一带一路”。在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中，我们又分别加入了三类控制变量，模仿效应始终正向且显著。模型四的系数可以被解释为，当 B 国与 A 国同为民主政体时，A 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会比其他政体组合情况高出 1.5 倍。

表 5 “一带一路”倡议扩散的模仿效应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仿机制” (A 国—B 国同为民主政体)	0.378 ***	0.458 ***	0.425 ***	0.435 ***
	(0.0872)	(0.117)	(0.121)	(0.121)
A 国政治经济变量				
人均 GDP		−0.536 ***	−0.359 ***	−0.366 ***
		(0.0629)	(0.0695)	(0.0701)
GDP 增长率		0.0197	−0.0121	−0.0114
		(0.0166)	(0.0182)	(0.0183)

续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A 国政治经济变量				
宽带覆盖率		0.0896 ***	0.0793 ***	0.0790 ***
		(0.00739)	(0.00820)	(0.00820)
美国盟友		0.854 ***	1.516 ***	1.527 ***
		(0.161)	(0.204)	(0.204)
政体		-0.0517 ***	-0.0177 *	-0.0177 *
		(0.00876)	(0.00941)	(0.00945)
A 国与中国关系变量				
与中国伙伴关系			0.876 ***	0.865 ***
			(0.101)	(0.101)
与中国接壤			-0.221	-0.233
			(0.166)	(0.167)
与中国军事冲突			-0.786 ***	-0.814 ***
			(0.186)	(0.187)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0.895 ***	0.916 ***
			(0.281)	(0.281)
A 国—B 国配对变量				
同盟关系				-0.246
				(0.202)
军事冲突关系				-0.147
				(0.348)
接壤关系				0.463
				(0.309)
常数项	-3.548 ***	1.284	-0.184	-0.123
	(0.690)	(0.903)	(0.954)	(0.959)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2	0.0481	0.190	0.405	0.415
N	1512	1359	1336	1336

注:表中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时间趋势项包括:每一个配对的持续时间(单位为年),持续时间的平方,持续时间的三次方;标准误在每个国家配对层面做聚类处理,* $p < 0.1$, ** $p < 0.05$, *** $p < 0.01$ 。

上述结果较好地支持了本文的前三个假设,即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都可以比较好地解释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探讨扩散机制与中国合作关系的交互作用。首先,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设,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越密切,学习效应越强。我们使用“与中国贸易往来”变量作为衡量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指标,并在表3中回归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学习机制”和“与中国贸易往来”的交互项。图2对“学习机制”的交互作用进行可视化展示,可以发现,当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越密切时,来自其他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就越能提升该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学习机制”的效应也会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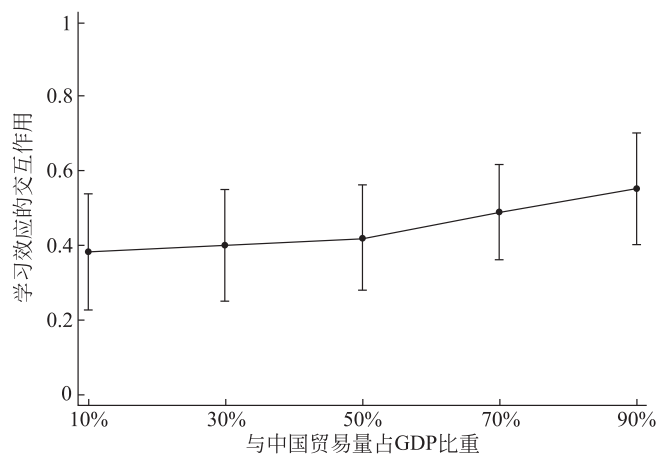


图2 “学习机制”的交互作用

注:数据来源请参照附录二,本图为作者根据分析结果自行绘制。横轴是与中国贸易量占GDP的比重,取值从最低的10%到最高的90%;纵轴是边际效应值,其中每个数据点显示的是,对于不同的与中国贸易往来数值,“学习机制”产生的边际效应与95%的置信区间。

本文也按照相同的方式,对“竞争机制”和“与中国贸易往来”的交互作用进行检验。与之前的假设预测相同,与中国贸易往来越密切,经济结构相似度对沿线国家产生的竞争压力就越大,“竞争机制”的效应也会越强,从而提高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见图3。

最后,我们还检验了“模仿机制”的交互作用。“模仿机制”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不了解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因此,在衡量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指标上,我们选择了“与中国伙伴关系”进行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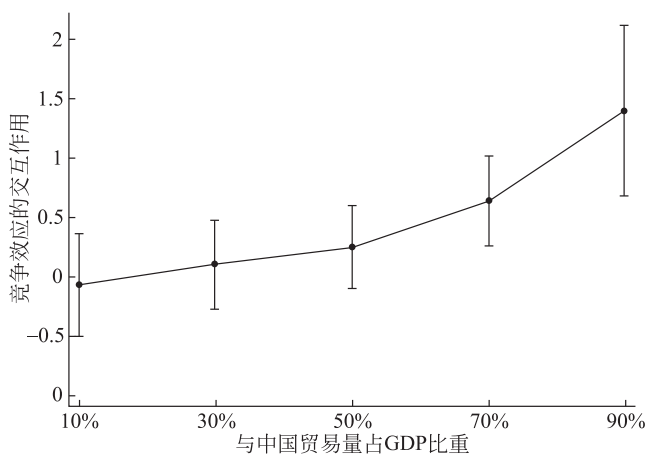


图3 “竞争机制”的交互作用

注:数据来源请参照附录二,本图为作者根据分析结果自行绘制。横轴是与中国贸易量占GDP的比重,取值从最低的10%到最高的90%;纵轴是边际效应值,其中每个数据点显示的是,对于不同的与中国贸易往来数值,“竞争机制”产生的边际效应与95%的置信区间。

更能反映出沿线国家是否与中国建立起常态化、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图4呈现了“模仿机制”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交互作用。可以看出,随着与中国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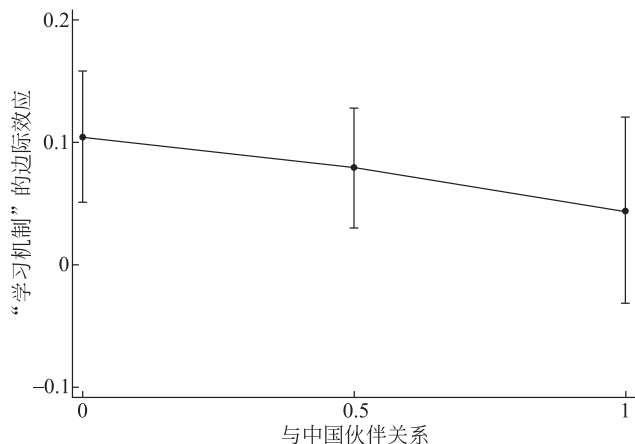


图4 “模仿机制”的交互作用

注:数据来源请参照附录二,本图为作者根据分析结果自行绘制。横轴是与中国合作关系,0=无伙伴关系,0.5=合作伙伴关系,1=战略伙伴关系;纵轴是边际效应值,其中每个数据点显示的是,对于不同的与中国伙伴关系,“模仿机制”产生的边际效应与95%的置信区间。

伴关系的加深,模仿效应的作用在逐渐减弱。这也说明,只有那些与中国合作关系不够密切、对中国不够了解、缺乏制度性沟通渠道的国家,才会更加依赖于来自相同政体国家的模仿效应。

五、结 论

本文基于政策扩散的视角,分析了沿线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影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我们发现,政策扩散中的“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和“模仿机制”均可以解释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学习机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提供了“拉力”:沿线国家可以通过“看中学”的方式,借鉴其他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成功经验,选择更积极地加入到“一带一路”中来。而“竞争机制”则为“一带一路”扩散创造了“推力”: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压力使得加入“一带一路”成为一项更迫切的需求,从而提高沿线国家响应倡议的积极性。“模仿机制”则帮助沿线国家消除国际合作中的不确定性,通过模仿与自己政治体制相似、互信程度高的国家的行为,为自己加入“一带一路”与否的决策提供支撑。此外,我们还发现扩散机制受到沿线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增强“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效用,但降低了“模仿机制”的作用。这意味着与中国亲疏关系不同的沿线国家,将会依赖不同的扩散机制加入到“一带一路”中来。

本文的实证发现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现有文献大多倾向于针对单一国家进行案例分析,侧重于解释静态的结构性因素。本文则通过在国际关系中引入政策扩散的理论和方法,为该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侧重于动态交互的研究方向,即重视国际合作中的时间性和次序性,研究国家间的学习、竞争与模仿等机制在促成国际合作中的影响。事实上,不仅是“一带一路”问题研究,政策扩散与国际关系的结合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经典国际理论的局限与有待完善的空间,政策扩散理论对于互动机制、时间因素的强调都为现有的国际合作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

在实践意义上,本文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新的认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在对外合作与拓展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周边国家的不信任。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打破这种怀疑和不信任,一方面要靠

中国自身的努力,与沿线国家建立起政治互信的纽带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依靠一些关键性的节点国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动员,从其国际关系网络中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本文涉及的三种扩散机制对于不同的沿线国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要因地制宜,注意分析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和担忧,对于不同的国家施以差异化的策略,从而有效扩展中国国际合作的“朋友圈”。

附录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文件一览

国家	响应时间	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
埃及	2016-01	中国与埃及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蒙古国	2017-05	中国同蒙古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新加坡	2017-05	
东帝汶	2017-05	
马来西亚	2017-05	
缅甸	2017-05	
柬埔寨	2016-10	中国与柬埔寨签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越南	2017-11	中国与越南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
老挝	2016-09	中国与老挝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文莱	2017-09	中国与文莱签署“一带一路”等双边合作文件
巴基斯坦	2017-05	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斯里兰卡	2014-12	商务部和斯里兰卡财政计划部签署有关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备忘录
孟加拉国	2016-10	中孟签署《关于编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
尼泊尔	2017-05	中国与尼泊尔等国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马尔代夫	2017-12	中国与马尔代夫签署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

续表

国家	响应时间	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
阿联酋	2018-07	中国与阿联酋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科威特	2018-07	科威特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
土耳其	2015-11	中国与土耳其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卡塔尔	2019-01	中国与卡塔尔签署“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文件
阿曼	2018-05	中国与阿曼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黎巴嫩	2017-09	中国与黎巴嫩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沙特阿拉伯	2017-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巴林	2018-07	中国与巴林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	2016-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伊拉克	201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阿富汗	2016-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
阿塞拜疆	2015-12	中阿签署《中阿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格鲁吉亚	2015-03	中国与格鲁吉亚启动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并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文件
亚美尼亚	2015-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
哈萨克斯坦	201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民经济部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吉尔吉斯斯坦	2018-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塔吉克斯坦	2015-09	中塔签署《关于编制中塔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
乌兹别克斯坦	2015-06	中乌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文件
泰国	2017-09	中泰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
印度尼西亚	2018-11	中印尼已签署推进“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建设谅解备忘录

续表

国家	响应时间	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
菲律宾	201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也门	2019-04	中国与也门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俄罗斯	201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波兰	2015-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波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塞尔维亚	2015-11	中国同波兰、塞尔维亚、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分别签署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
捷克	2015-11	
保加利亚	2015-11	
斯洛伐克	2015-11	
阿尔巴尼亚	2017-05	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克罗地亚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克罗地亚	2017-05	
波黑	2017-05	
黑山	2017-05	
爱沙尼亚	2017-11	中东欧 16 国已全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立陶宛	2017-11	
斯洛文尼亚	2017-11	
匈牙利	2015-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马其顿	2015-04	中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马其顿共和国经济部关于在中马经贸混委会框架下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谅解备忘录》
罗马尼亚	2015-11	中罗已签署《关于在两国经济联委会框架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拉脱维亚	2016-11	中拉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
乌克兰	2015	2015 年中乌签署“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协议
白俄罗斯	2014-12	中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议定书
摩尔多瓦	2017-11	中东欧 16 国已全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附录二、扩散机制的交互作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学习机制 *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6.434^{**}		
	(2.814)		
学习机制	2.762 ^{***}		
	(0.673)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4.387 ^{***}	-55.23 ^{***}	0.820 ^{***}
	(0.509)	(16.50)	(0.285)
竞争机制 * 与中国贸易占 GDP 比重		50.36^{***}	
		(16.86)	
竞争机制		-1.296	
		(1.993)	
模仿机制			0.554 ^{***}
			(0.148)
模仿机制 * 与中国伙伴关系			-0.348
			(0.225)
与中国伙伴关系	2.341 ^{***}	2.538 ^{***}	1.088 ^{***}
	(0.253)	(0.301)	(0.184)
常数项	7.100 ^{***}	9.411 ^{***}	-0.298
	(0.877)	(2.333)	(0.971)
A 国政治经济变量	是	是	是
A 国与中国关系变量	是	是	是
A 国—B 国配对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pseudo R2	0.389	0.418	0.117
N	1630	1336	2332